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反犹主义

李 工 真

德意志社会中存在一种反犹思想,由来已久。纳粹匪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罪行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但是人们总在问:“为什么纳粹主义者那么痛恨犹太人?”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德意志社会历史中反犹运动长期发展的结果。德意志帝国时期反犹运动由旧式传统的反犹向新式现代反犹的转变,与纳粹的反犹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意志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业革命的成果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为德意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它极大地促进了德意志的技术、组织和生产的革新。这种迅速加强的社会变革所产生出的压力是既能为人们所利用,同时又是人们所必须加以忍受的。在历史上具有经营商业传统的犹太人,值此如鱼得水。德意志犹太人更表现出他们最能适应这种形势。从比例上看,他们往往在收入和所受教育的程度上胜过了非犹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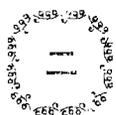
在1871至1910年间,德意志帝国内的犹太人口从512,000人上升到615,000人,而在总人口的比率上则由1.25%下降到0.95%。^①犹太人2/3生活在普鲁士,并集中在大城市里。“1914年已有60%的犹太人成为大城市人口,而非犹太人中只有20%是大城市人口。1914年每四个犹太人中有一个在柏林市内有住所。尽管犹太人仅占柏林人口的5%,但他们缴纳了该市1/3的所得税。别地的情况也是如此。100个最富有的普鲁士人中有30个是犹太人。”^②在高收入人口中犹太人的比例极大地超过了平均值。“到1871年,在德国生活的犹太人中大约60%上升到中产阶级和上层税率等级。”^③而到1900年,德意志犹太人中的4/5已属于上层和中层资产阶级,其中50%以上是独立经营者(大都是小店铺老板),这是非犹太人的2倍^④。

与经济地位的提高相应的是,犹太人在文化方面也居于优越的地位。“19世纪90年代初,柏林的某些人文中学里有25%的犹太学生。在高等学校里犹太学生一直占8%,到189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0%。而在法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等专业中,他们的比例则更高。”^⑤同时,德意志社会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犹太学者,其中获诺贝尔奖的不乏其人,如保罗·埃里希、海因里希·赫茨、弗里兹·哈伯、马克斯·波恩。在社会学方面也有一批著名学者,如洛温·哥德斯密特、保罗·拉班德、赫尔曼·科恩。在出版界、文学界、戏剧艺术界,犹太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成为作家、记者、编辑、出版人,如著名的文学出版界人物萨穆尔·费希尔,报纸发行业的莫泽尔·乌尔斯坦。在社会活动家中,除了流亡海外的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以及大诗人海涅外,共产党奠基人罗莎·卢森堡、工人运动的著名人物菲·拉萨尔、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路·伯勒、爱·腊斯克、路·班贝格都是犹太人。

这个在人口比例上不过1%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不仅具有如此之高的富裕程度,而且又

具有如此之高的文化和教育水平，并产生出如此之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这不仅反映出他们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的自由上升能量，而且也反映出他们在智慧和知识上的巨大潜力以及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影响力。

但是，犹太人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的提高，在这个他们曾世代代遭受宗教迫害、社会歧视的德意志社会里，必然会加剧他们与非犹太德意志人之间紧张的社会关系的。而且，在这个不是通过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通过容克贵族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和王朝统一战争来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国度里，犹太人“解放”的速度越快，他们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就越是尖锐。



激烈竞争造成的压力使不少人找到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通往胜利的道路，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一条相反的道路。犹太人由于自中世纪以来就在“低人一等”的商业贸易、现金交易之类的行当里艰难谋生，因而造就了他们对商品经济的适应能力。这样，犹太人便表现出他们似乎比其他人更熟悉那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因而也就表现得像是资本主义的发起者一样。这使得德意志非犹太中产阶级的反犹具有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基础。

从职业上讲，德意志非犹太中产阶级一般又可分为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以及小农阶级。作为老中产阶级的非犹太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进程既陌生又怀有敌意。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感受到自身传统的中间地位受到了强烈震动。那种害怕“在大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被撕碎”的恐惧，使他们传统的仇犹心态不仅具有了竞争上的强烈意向，而且还具有了某种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性质。由于他们将大部分困境归于日益增多的商店，而在他们看来，“这些百货商店就是典型的犹太人的发明”，^⑥因此，将造成困境的根源归于犹太人最符合他们宗教传统中的仇犹观念。这大大促进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以致于他们认为：“犹太人是黄色国际(国际金融资本)与红色国际(共产国际)的幕后操纵者。”^⑦

新中产阶级是指商业和货币流通领域中的受雇者，即商店和银行职员。作为受雇者，他们与产业无产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劳动时间、劳动收入以及劳动独立性方面，他们具有比产业工人有利得多的地位。因此，从意识上讲，他们是向中产阶级靠拢的。这首先决定了他们对私人占有问题上不同于产业工人阶级的态度。由于产业无产阶级在受剥削的生活实践中看不出犹太与非犹太资本家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也由于犹太人在产业资本中的确没有什么地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产业无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反犹是没有市场的。但是，犹太资本最集中的领域正是商店和银行，^⑧这就首先使那些受雇于犹太资本的职员中萌发了经济上的反犹情绪。因为融于民族主义中的反犹情绪能够为这些职员求得一种特殊的意识地位，而这种地位又恰恰是与他们当中日益发展起来的要与国际无产者区别开来的强烈愿望相一致的。因此，他们将经济上反资本主义剥削的念头都转移到对犹太人的仇恨和种族情绪上了，从而使得他们的反犹情绪打上了反社会主义、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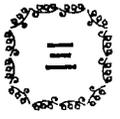
小农阶级反犹情绪的爆发是以德意志农业结构性危机为背景的。这个阶级的成员，由于传统的反犹观念，本身就对犹太银行家、典当商、谷物、牲畜商人的存在感到恼火，但又往往要依靠一个犹太当铺和银行家的贷款，或通过一个犹太商人将农产品销售出去。而在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中，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意义不断下降，造成的后果恰恰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和信贷利息的增长。这自然加剧了农民的困境。因此，将犹太人视为“罪魁祸首”便成为他们的一种相当自然的表达。因而在他们的反犹意识中带有强烈的反自由主义、反工业现代主义

以及不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保守性色彩。

著名评论家特奥多尔·冯塔纳表达了整个非犹太中产阶级的仇犹心理，他写道：“犹太人太目空一切了，以致于我不仅乐于看到他们会有一场真正的失败，而且希望他们会有一场真正的失败。每当他们现在不再遭受苦难，并且也不再象过去那些时代中那样的时候，我就坚信：会有一场大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的！”^⑩

1873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萧条不仅结束了帝国建立以来的经济繁荣，而且也揭开了帝国时代反犹运动的第一页。写下第一本反犹专著的是汉堡记者威廉·玛尔。他在1873年发表的《犹太人对日耳曼人的胜利》一书中，将造成这场危机的责任完全推到了犹太人身上，而且还头一个发明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us)这个词。该书在6年中竟再版12次之多。正是在这本书里，他明确地写出“犹太人是将基督教徒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以及“民族剥削者”的观念。^⑪于是，一场由中产阶级发起的“反对犹太交易所的骗人买卖和剥削勾当”的运动登场了。

自1873年以后，在各地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中小企业中贫困化阶层的支持下，各种保守或激进的反犹政党和组织纷纷出笼，它们是“基督教社会党”、“社会帝国党”、“泛反犹联盟”、“德意志社会党”、“德意志社会改革党”、“农业联盟”、“德意志民族店员联盟”，“德意志大学生反犹联合会”，以及臭名远扬的“泛德意志同盟”与“德意志祖国党”。势力最大之时，甚至有16位帝国的达官贵人与他们为伍。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一直获得稳步发展的还不是那种由于经济原因而触发起来的反犹主义，而是来自文化知识界右翼集团的反犹主义。从严格的经济地位上讲，文化知识界成员也属于中产阶级的范畴。这个领域里的成员是可能为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这一点往往取决于他们的出身、经历以及思想体系的影响。最极端的反犹主义出现在这个领域中的右翼集团里，这与他们有特别多的犹太同行有关。没有这些竞争者，他们无疑会过得更好。但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这个集团传统的文化观念受到了知识界先驱者们的挑战，而相当部分的犹太人是属于这个先驱者阵营的。

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德国有长期分裂的历史和封建传统，正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拿破仑占领之后，在德意志民族自尊心遭受了严重挫伤之后，才开始去完成民族统一的任务的。然而，在文化知识界的右翼思想家那里，“民族”这个概念从来就不是作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表达，而是作为某种由于语言、文化、传统上具有“独特天性”的东西来理解的。由于他们想用“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间的自然联盟”的德意志模式来对抗“自由人之间的政治联盟”的法兰西模式，所以他们追求的不是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不是对政治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的变革，而是本民族的统一、强大、影响和权力，以及重建所谓德意志的“传统美德”。这样，在1871年帝国建立后，在这些自诩为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精英”，而在文化观念上还基本是乡村式的“思想家们”那里，不仅犹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被视为敌对民族的思想——1789年法兰西革命思想——在德意志社会渗透的结果，而且连他们所反感和仇视的一切东西，如现代城市文化，包括现代戏剧、无调性音乐、现代建筑风格、绘画和文学中的表现主义，以及西方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都与犹太人相提并论了。

这个集团的成员又可以分为两派：即右翼保守派与右翼激进派。1890年以前，在这个集团中占优势的是前者，他们大部分来自容克阶级家庭，并往往与皇室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他们极力主张建立“基督教民族国家意识”，因而又与中世纪的宗教反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的十年时间里，由于俾斯麦与自由主义者结盟，而且为了“政教分离”的需要采取了反教会的政策，右翼保守思想家是处于守势的。但是当19世纪70年代末经济危机的尖锐化，最后导致了帝国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方案被保守主义方案所取代时，他们建立“基督教民族国家意识”的要求获得了发展的机会。由于这种意识中所宣扬的对“德意志民族特性”、“文明教养”的赞扬有利于使广大民众忘掉他们所受的压迫形势，特别是非犹太中产阶级中普遍的仇犹情绪也能够为这种意识找到一种政治上的寄托。因此，利用反犹主义来驯服工人运动、巩固中小资产阶级对皇室和旧式传统的忠诚的重要性在社会上显示出来。在这种背景之下，1879年容克思想家、柏林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契克头一个说出了保守派们的心里话：“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①

特莱契克并没有在犹太人洗礼改宗和文化“同化”问题上提出疑问，但他宣称：“我们并不想在日耳曼文明的千年之后来一个‘德意志——犹太混合文化’，因此，必须规定，犹太人要么无条件的德意志化，要么滚出去！”并且号召：“必须在唯一神圣的民族文化上加速征服。”^②在这里，犹太少数民族已经不是被指控为经济上的“犯罪集团”，而是被作为“外来的文化异体”，并因此被作为这个年轻帝国的永久性威胁来看待了。这种观念不仅在容克——大资产阶级的保守党中，而且在天主教中央党中都引起了共鸣，以致于它们也开始玩弄起反犹把戏在中产阶级中拉选票了。

随着俾斯麦的下台和威廉时代(1890—1918)的到来，工业革命的社会效果充分显示出来。在现代化经济强有力的推动下，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以及集团利益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从中得到好处的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上的合法关系，它们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均等”。当然，这种机会也是能够为右翼激进的知识份子们所利用的。而且，由于《非常法》的废除，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快了这种变化的速度。一个有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也登场了，大量“公民倡议”在公众中不仅提出了对帝国统治的种种批评，而且提出了对国家政治进行改革的种种方案。因此，工业化开放性社会形态对帝国旧式的大农庄社会结构的挑战性处处显示出来。在应付这种挑战方面，鼓吹“基督教民族意识”的右翼保守派日益显得力不从心了。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在帝国主义列强分割地球的竞争中，为了“阳光下的地盘”，冒险主义变得更为明显。欧洲“旧世界”的分裂以及美洲“新世界”的威胁性之影响是全面的，它使扩军备战的要求显得更为紧迫。这就必须有一种能在德意志民众眼睛里证明这种扩军努力是合理的意识形态。由于同属于“白色人种”的西方列强在宗教上有着与德国基督教同源的性质，因此，在这方面，“基督教民族意识”便显得无济于事了。另一方面，技术和组织上的进步和变化使得对社会发展趋势进行调整成为了可能，而19世纪90年代重新出现的经济繁荣和高涨也确保了德意志社会中的种种大胆尝试。所有这些都使得“要求更多民族团结”的意识获得了一种进攻的态势，同时也为文化知识界中宣扬“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右翼激进派的反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右翼激进派成员往往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他们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文学科的大学毕业生。”^③犹太大学生就学率的超比例本身就使他们在就业前景中面临了与犹太文人激烈竞争的局面，而犹太人在文化思想界的进步角色更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因此，在从事文化职业的同时，他们往往通过激进的反犹来谋求政治上的生涯。正是这些人源源不断地为反犹政党和组织提供着政治和理论上的指导者。

尽管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反犹主义同样具有反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现代主义的特点，但在保守派那里，反犹还只是作为一种捕捉选票的工具来使用的。而在激进派这里，“解

决犹太人问题”始终是他们的真实目标。在他们看来，犹太民族是不可能获有“种族来源与血缘关系上是德意志民族成员”的证明的。因此，他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导致了以种族界线为标准的划分“朋友——敌人”的政治大退化。

在这场政治大退化中，海因里希·克拉斯是作为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出现的。这位特莱契克的学生、“泛德意志同盟”的领袖表达了对老一辈人身上的“宽容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愤慨。当一位82岁的同乡老人向他表示，他是将犹太人看作与自己一样平等的同胞时，克拉斯这样对他说：“我们年轻人是要进步的，……当宽容在善待民族和国家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想从这种宽容中学习任何东西。我们将抛弃这个意义上的每一种自由主义观念中的人道主义！”^⑭而且他们公然宣称：“所有那些从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出来的、以及由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所体现和宣传的东西都应抹掉！”^⑮他们的反犹主义已无需再用宗教、文化、经济上的理由来遮遮掩掩，它现在的理由直接就是人种上的理由，即所谓“人和种族的不可改变的天然属性。”正是这种与种族主义的结合，使德意志的反犹主义完成了由旧式传统向新式现代的划时代转折。因为这种具有反启蒙主义、反理性主义色彩的，为人类不平等进行公开辩护的教义已彻底否定了环境和教育的因素，因而也就否定了任何“同化”的可能性，更不要说被作为“民族和国家的敌人”的犹太人“解放”的可能性了。在特莱契克那代人中还起一点作用的“同化”运动中的“和解精神”在克拉斯这代人身上已完全枯死了。

马克思主义的政敌、柏林大学的编外讲师杜林此时发表了名为《作为种族、习俗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一书，为这场现代反犹运动提供伪科学的根据。他大骂：“毫无创见、文化上毫无价值可言的、狂放不羁、自私自利的犹太人处于种族阶梯的最下层，其下流本性几乎不耻于人类。犹太人事实上是所有民族的敌人，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敌人。拯救德国的办法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首先是反犹太同化和解放的斗争。”^⑯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家们”以同样重的份量极力描述所谓人类最上等的种族——雅利安日耳曼人的等级与创造才能。赫·斯·张伯仑在他那部浅薄拙劣的作品《十九世纪的基础》中这样写道：“条顿民族是人类命运真实的安排者和指挥者，是新思想和原始艺术的创造者。我们今天所有的文明和文化都是一个特定的人种——日耳曼人的杰作。”^⑰总之，这些作品创造出一种反命题，其中，犹太民族仅仅只是作为日耳曼——德意志民族理想模式的对照物出现的。即他们认为：犹太人毫无根基，而日耳曼人土生土长；犹太人依赖于外部的法律，而日耳曼人在习俗上是独立自主的；犹太人满脑袋只有商业意识，而日耳曼人的所作所为都具有思想深度；犹太人喜欢的只是流于表面的无所事事，而日耳曼人则具有扎根家乡的历史固定性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富有创造性的个性。

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泛滥，政治思想上的生物化倾向在现代反犹主义中成为了强有力的因素。以致于这些反犹理论家们认为：不仅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障碍从原则上讲是不可逾越的，而且绝对优秀种族与绝对低劣种族之间的战争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叫喊：“这场生存竞争是民族之间根据自然法则所必然要进行的。”并主张“首先必须清除低质、危险的犹太因素。”^⑱1890年赫尔曼·阿尔瓦尔德发表了《雅利安民族与犹太人最后的斗争》一书，此人于1895年在帝国议会的讨论中，竟头一个将所有犹太人称为“掠夺性的野兽”和“霍乱病者。”^⑲所有的反犹文章都少不了“犹太人企图统治世界”，尤其是“对德意志进行征服”的警告性描述。而且连反犹的具体行动计划也在设计之中了。克拉斯在这方面也是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他在1912年出版的《假如我是皇帝》一书中提供了剥夺犹太人财产和权力，将犹太人全部逐出德国的措施表。而卡尔·帕希在这方面超过了他。此人在《反犹明镜》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最简单、最实际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无疑在于将犹太人消

灭掉！这是合乎逻辑的目标，因为驱逐并不能解决问题，犹太人还会在另外的国家发挥影响。”^②而这正是1933年后希特勒纳粹德国所要达到的反犹目标！

总之，来自文化知识界右翼集团的现代反犹主义是一种既顽固又反动的意识形态。它不仅能够通过经济危机来扩大其社会基础，而且甚至能通过经济繁荣来得以加强，因而能在德国以后的剧烈政治变迁中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为纳粹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内容。



人们一定会问：既然反犹主义在德国已如此地有市场，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为德意志犹太人在帝国时代的生存提供了保证呢？

除了左翼自由主义者以及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广大工人阶层不反犹外，其重要原因，是德意志帝国时期，权力不在政党、集团手里，而是在君主和贵族手中，以及由他们所操纵的官僚机器手中。尽管帝国宪法形成了一种“人民代议制”，允许言论、结社自由（除《非常法》曾禁止过社会民主党外），但这种体制是不允许政党集团竞争最高权力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帝国政府拒绝激进的反犹主义方案的原因，不在于它所鼓吹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在对外政治上的作用，也不在于它的反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的特点，而在于这种方案同时还具有强烈的反保守主义的特点。反犹激进派公然将矛头指向了现存的权力关系和保守党，最后是整个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主要是对容克大地主和大工业家们有利的。他们“要求取消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和实行累进税制”，并企图“将所有反帝国秩序的反犹民众集合在共同的旗帜之下。”^③这种方案连保守的反犹主义者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统治集团中有人认为：“对它的让步必然会导致对整个德国的战争。”^④

另外，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里仍然是搞“开明专制”的。这种“开明专制”的特点就是吸收一切可能有用的东西来维护和加强皇帝的统治。尽管威廉二世本人也对犹太文人在文化生活中的进步角色表示反感，但是他看到了近4/5已进入到纳税等级的犹太人对德意志帝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增加军备变得日益紧迫的情况下，他自然得出了与俾斯麦同样的结论：“犹太人的益处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危险性。”^⑤并认为激进的反犹主义“太幼稚了！”^⑥

在犹太人问题上，国家当局采取了“貌似中立的立场”。尽管政府一再声称坚持1871年帝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国民享有平等权利”的立场，从未对任何反犹方案表示过公开的支持，但还是在实践中对保守的反犹主义采取了半接受的态度。一方面，国家保证了犹太人与所有国民一样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权，在反犹事件中出动军警给予保护，但另一方面，国家却拒绝向未改变信仰的犹太人提供国家公职，所有体现国家权威的岗位和职业都是对犹太人关闭的。受排挤的现象在军队中最为明显，在普鲁士的德国，与军队的关系决定着通向国家领导的生涯。而犹太人，无论是否改宗了信仰，连预备役中的少尉都不能担任。但是，对犹太人想成为具有犹太教信仰的德意志国民的愿望，威廉二世表示了尊重。例如：“在柏林市法萨仑大街上的犹太大教堂，采取了古典式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外观，它的婚礼厅内嵌着宝石的瓷砖正是由威廉二世的私人瓷器制作师设计的。”^⑦它成了一种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经济上富裕的象征。所以，尽管犹太人在军队和学校里受到了种种歧视，看到自己明显地被排除在有权有势的圈子之外。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在他们的生涯中仍可能是有前途的，而且仍能指望在冲突事件中得到国家的保护。德意志犹太人正是在这种“开明专制”的精神中找到了在德国生活下去的理由和保证。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犹太人的从军热情之高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证明。参军的德意志犹太人总计达10万之众，即1/6的犹太人上了前线，其比例丝毫不低于非犹太人。德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志愿兵是13岁的犹太人约瑟夫·齐帕斯，帝国议会中的第一位志愿兵是犹太

议员、社会民主党人路德维希·弗朗克。他们的口号是：“正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所以我们要为祖国尽更多的义务！”^⑳

因此，在德意志民族运动扭曲离奇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似非而是的形势：即极端的非自由主义的德国现代反犹太主义，当它想在政治上贯彻其纲领、享受其权力的时候，它需要这个“开明专制”的君主制国家的崩溃，以及权力向一个“自由”、“民主”的议会政党制的过渡来作为它绝对必要的前提。而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恰恰为这种发展铺平了道路！

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反犹太主义的发展是与犹太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社会地位迅速提高直接发生关联的。这场反犹运动不仅有着宗教迷信和传统偏见上的根源。而且更是对社会超强变化的压力作出的反映之一。这种压力是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中释放出来的。非犹太中产阶级在与犹太同行的激烈竞争中所触发起来的反犹太主义是可以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而时落时涨的。但是，作为对这种压力的否定式回答，来自非犹太文化知识界右翼集团中的激进的反犹太主义，采取了与反启蒙精神的种族主义、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结合的形式，从而完成了从旧式仇犹到新式现代反犹的划时代转折。而且，由于这种现代反犹太主义的力量是以“捍卫民族和国家”的冠冕堂皇的名义来行事的，因此它既能通过经济危机在社会上扩大基础，在德意志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中保留下来。最后，这种现代反犹太主义带着19世纪资产阶级的体面烙印。正是这些反动力量极大地影响了德意志历史在20世纪的前半期。

尽管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反犹太主义还没有成为国家力量，但在犹太人问题上，它使犹太人走上“同化”和“解放”之路成为可能。但同时使社会上的反犹思潮和政治上的现代反犹力量的公开发展也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它又使犹太人的真正解放成为不可能。但同时使那些反犹力量问鼎最高权力也成为了不可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现代反犹太主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了。随着德意志帝国战争胜利前景的动摇，这种民族主义所极力鼓吹的“内部更加统一化”，只能导致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德意志人越是“德意志化”，犹太人就越是“异体化”。虽然这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发展还要走过魏玛共和国的历程，但是在“魏玛道路”的尽头，就是德意志犹太人以及欧洲犹太人的大难临头之日！

注释：

- ①⑩ 依斯玛尔·埃尔波根、伊罗洛勒·斯特林：《德国犹太人史》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249、255页。
②④⑦⑫⑮⑳ 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中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1985年版，第251、251、281、255、258、263页。
③⑧⑨⑲ 霍尔曼·格拉马尔：《帝国砸破玻璃的夜晚》慕尼黑，1988年版，第46、77、79、79页。
⑤ 汉斯·马丁·克林根伯格：《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科隆，1963年版，第381页。
⑥⑧⑬⑱⑳ 霍尔穆特·贝尔丁：《德国的现代反犹太主义》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24、124、112、105、139页。
⑨ 克·施莱内尔特编：《特奥多尔·冯塔纳书信集》第三卷，柏林，1969年版，第58页。
⑪ 瓦尔特·伯尔里希：《柏林的反犹太主义争论》法兰克福，1965年版，第11页。
⑭ 海因里希·克拉斯：《迎着暴风雨》莱比锡，1932年版，第17页。
⑮ 欧根·杜林：《作为种族、习俗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柏林，1890年版，第32页。
⑯ 赫斯通·斯特瓦尔特·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第1卷慕尼黑，1937年版，第7页。
⑰ 帕·威·马斯昆：《政治上反犹太主义的来历》法兰克福，1986年版，第113页。
⑱ 赫·林格尔：《德意志现代反犹太史》，波恩，1986年版，第32页。
⑳ 西格贝特·福伊希特旺格尔：《作为科学和政治问题的犹太人问题》柏林，1916年版，第65页。